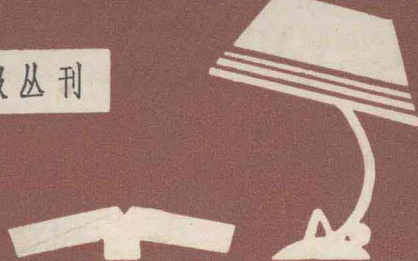


四川省图书馆学报丛刊



中国书史简说

著者 胡继森 钟昌嗣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主编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984 成都

中国书史简说

著者 胡继森 钟昌嗣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主编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984·成都

中国书史简说

著者 胡继森 钟昌嗣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主编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出版
(成都东风路222号)

四川智力资源开发公司 发行
广汉县印刷厂 印装
字数9.6万 印数4500—9500册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83号

中国近代史

本套丛书主编：彭长登

副主编：孙述万 汪应文 程仲琦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海生	付继德	戴克瑜	许万雄
刘启柏	<u>伍宗华</u>	朱集汉	孙德辉
陈克	陈铎	陈国惠	陈光楹
陈茂军	汪恩来	张德芳	李金水
杜桑海	杨以凡	何宝禄	吴声亮
查启森	胡继森	钟昌嗣	顾嗣芳
徐蜀江	顾训坚		

四川省图书馆编辑部

· 480 ·

出版说明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省图书馆事业很快开始恢复和发展。但是，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损害，并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消除的。尤其是图书馆工作人员青黄不接的状况，构成了图书馆事业前进中的新的严重困难。为了尽快地培养出一批青年图书馆工作者，以适应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需要，我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于1978年组织编写了一套图书馆学知识教材。经过几次短期培训班试用，效果很好。当年在培训班接受这套教材训练的青年人，有不少已成为各图书馆的业务骨干。

尽管这套教材由于编写仓促，体例不一，学时安排多少不均，不少地方还失于粗糙，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思想比较解放。尽管初稿完成于1978年5月，仍然较多地清除了旧教材（包括六十年代和十年动乱中编写的）中明显地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极左的影响，力求实事求是地论还和介绍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图书馆技术；

第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组织编写时，一开始便确定，这套教材，不仅要让接受培训的青年同志或转行加入图书馆战线的同志，掌握图书馆工作的一般技术，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知其所以然”，为日后的进一步学习和钻研理论

打下基础。从教学实践来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三：有广泛地适用性。不仅适合对在各类型图书馆工作的青年同志的培训，也适合情报系统培训业务人员的需要；

第四：有较大的弹性。只要教师充分地掌握和熟悉了教材，不仅可用于培训初学者，亦可用于培训初级以上的业务人员；

第五：突破了多年来图书馆学教材的结购。有许多课程。比如“读者工作”、“期刊管理”、“汉字排检”等等，多年来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中都不设专课讲授了，而实际工作中，都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因此，这套教材将它们从其它教材中抽出，并充分展开，从而突破了旧的教材结购体系，从实践的结果看来，这样作是合适的；

第六：引进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教材从着手编写到现在付印，经过几次大的修改，每次修订都吸收了近几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和一些新鲜的工作经验。比如《图书馆学概论》，就大异于迄今为止所有的同类教材和论著，从体例到内容莫不如是；《图书馆科学管理》也迥异于旧的《图书馆行政与组织》，它吸收了近年来大倡于世的“管理科学”的某些原理和经验，是一个填补空白的教材；《藏书建设》、《文献与文献搜集》等教材，不仅多数内容为过去所没有，且关于藏书的极限、剔旧的新概念等等，也都是近几年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至于《读者工作》中引进的新鲜经验、新的研究成果，就更加彼彼皆是了。这样作，在于尽可能给学员以新的知识，以便提高起点。

由于这套教材有上述特点，受到了图书馆界的欢迎和赞

许，有不少单位还将它的油印本翻印了。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在成都召开期间，与会代表一致要求我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省图书馆学会，对这套教材进行修订，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以应全国图书馆界的急需。据此我省学会组建了专门的教材编辑委员会，对这套教材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学术委员会对这套教材的修改稿进行了认真、严肃地审查、讨论。与会的学术委员充分肯定了教材的质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建议。书目文献出版社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同我省学会和教材编委会的负责同志商妥，待进一步修改后，全套交由该社出版。嗣后，教材编委会多次研究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修改建议，结合我省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情形，参照近年来的新的研究成果，再次对教材作了修改。这样，这套教材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写出初稿，到一九八一年写出第三次修改稿，历经四年之久。它既是我省图书、情报界许多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同时包含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它的学术委员会的许多同志的心血，可以说，它是一个大协作的产物。

最后的修改稿从一九八一年八月起，陆续送交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该社通知我省学会，由于某些原因，这套教材不能全套出版了。应当说明，当初编写这套教材，仅仅是为了教学急需，几次组织修改，也仅仅是为了改进教学和完成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它的学术委员会的委托。现在，既然几经修改，内容日趋丰富，体例基本统一，质量有所提高，听其夭折，似乎可惜。于是我省学会在成都的常务

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们，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如不全套出版，势必打乱原有体系，使之成为一个残缺不全的畸形儿。因此，决定作为“《四川图书馆学报》丛书”全套出版，并易名为《图书馆学知识丛书》，既可作为教材使用，又可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业余自修使用。

这套丛书共十六种，它们是《图书馆学概论》、《科技情报概论》、《中国书史简说》、《文献与文献收集》、《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中文图书编目法》、《西文图书编目法》、《中文期刊管理知识》、《图书馆藏书建设》、《中文资料管理》、《汉字排检法》、《读者工作概说》、《图书馆参考工作》、《科技文献检索与服务》、《图书馆科学管理》、《图书馆业务辅导工作》等。

最近，我省“图书资料专业干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决定，我省各类型图书馆（室）在评定业务职称时，凡需要通过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考试的人员，都可以这套丛书中的某些子目作为命题和评卷的依据。因此，尽快地出版这套丛书，就显得更为必需了。

最后，借此机会，向所有对本丛书提供过修改建议和使用本丛书作过教学实践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图书馆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次

前 言	(1)
-----	-----

第一章 甲骨文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	(11)
第二节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14)
第三节 甲骨文的形式和契刻	(19)
第四节 殷商时期的字汇和书体	(21)
第五节 卜辞的内容和排列	(25)
第六节 甲骨文中的记事文	(27)

第二章 金文和陶文

第一节 金文的性质	(31)
第二节 金文的特征和用途	(34)
第三节 货币文字、印章、封泥	(38)
第四节 陶器、砖瓦款识	(41)

第三章 玉石刻辞

第一节 石鼓文及碑、摩崖、墓志	(47)
第二节 石经	(51)
第三节 释道经典刻石	(54)
第四节 拓刷的起源和技术	(58)

第四章 竹简木牍

第一节	书籍材料的演化	(63)
第二节	简策书籍	(67)
第三节	木牍书籍	(70)
第四节	简牍的单位及编装形式	(72)

第五章 帛 书

第一节	丝织文化的起源	(77)
第二节	帛书的年代和发现	(79)
第三节	帛卷的材料及形式	(84)
第四节	帛书的特殊用途	(86)

第六章 纸卷和印刷术

第一节	纸的发现	(90)
第二节	敦煌纸卷	(94)
第三节	卷轴制度	(95)
第四节	册叶制度	(99)

第七章 印刷术对书籍的影响

第一节	印刷术的发明	(108)
第二节	印本书籍的风格	(111)
第三节	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116)
第四节	近代书籍的发展	(119)
第五节	现代科学技术对书籍的影响	(123)

后 记

前 言

图书馆是专门管理和利用图书的社会事业单位。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自然应当对图书有所了解。我们应当弄清楚：

图书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么发展的？

古代有哪些种类的图书，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图书在社会发展中起些什么作用？

我们国家图书的发展历史。

一句话，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关于图书的较系统的知识。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对我国古代图书作些初步介绍。其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图书的历史，为研究图书产生、发展，提供一些基础知识。为广大青年图书馆工作者了解我们工作的对象，勾划一个轮廓。

在介绍我国图书历史之前，我们须先对以下几点作些说明：

（一）我们图书馆工作者为什么要学习书史

首先，现在，人类对自身过去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全部依赖于书籍和传说。而作为信使来说，则只有书籍了。我们现代人，通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籍，了解历史，了解了我们祖先是如何通过顽强的、坚刃不拔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一步一步地发展成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高度的文明，我们通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籍，还了

解了我们祖先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技术的种种到今天仍是可借鉴的经验；回顾我们社会发展的历史，一代比一代进步，一代与一代地更努力，更成熟地同阶级敌人斗争，同自然界给我们造成的灾害斗争。可以明显地看出，书籍是我们手中的一种锐利的武器。书籍是我们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由于它是记载了前人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知识。有了这种知识的武器，我们就可以更加聪明，更加成熟地去同新的阶级敌人作战；可以更有能力，更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使我们社会更加进步，使我们能建立起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的书籍是从古代书籍发展演变而成的，它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众人皆知了。

既然书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作为专门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自然应当比一般读者；比其它学科的研究人员；比其它事业的工作人员，对图书产生、发展的历史知识，有更多的了解。

其次，我们国家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亚洲东方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育，建立起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包括了无数的科技发明和创造，涉及图书的就有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发明。这些，都不仅值得我们后代引以为自豪，而且也为世界所公认。学习中国书籍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祖先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树立起我们民族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更加勤奋地从事社

会主义建设，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是管理图书的，我们不仅要管好、用好现代的图书，我们还要管理古代流传下来的图书。书史的知识是管理古书的基础知识。缺乏这种知识，我们可能面对古书而一无所知。因此，学习它，是我们业务工作的需要，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功。

（二）我国古代的图书同外国古代图书的比较，中国古代图书有哪些特点

在人类发展史上，建立古代灿烂文明的民族和地区，据有关专家考证，共有六个：中国仅是其中之一。在六个古代文明发源地，中国、印度、希腊、埃及、阿拉伯、巴比伦中，都有图书这种记载知识的物体出现。但中国的书籍却是最有特色的。中国书籍从产生后，不断演变，发展到唐代时，无论从类型、形式、技术都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而且影响全世界。各国书籍，基本上是采用从我国传出去的技术印成的。而其它五个古代文明发源地则没有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它们在创造了自己的古代书籍后，就停止发展了。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没有专门介绍国外古书的章节。因此，这里简要地作一介绍，以便同中国书籍之比较，并从比较中看到中国古书的特点。

古代阿拉伯人曾用羊的肩胛骨作书写材料。据说，穆罕默德的《古兰经》，最早就是写在羊的肩胛骨上的；

在古巴比伦人居住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河口上，它们用粘土做成过“书”。人们在它们生活过的遗址上，考古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书”的图书馆；

古代埃及人是用纸莎草做书写材料的。就是纸草书。后

来进一步发展，采用皮革做书写材料；

古代希腊人则用腊作书写材料。他们把腊熔化后，倒在制好的木盒内，染成黄色或黑色作书写材料，制成“腊书”。

在古代中国，情况则稍有不同，曾用过的书写材料就有甲骨、石头、青铜、玉、竹木、缣帛和在汉代发明的纸张。

从书写的材料可以看出，中国所用的一部分书写材料尽管同国外一样，是自然界现成的物质。但却有一部分是经过加工的，是需要较高工艺水平的。例如：青铜、玉、竹木、缣帛及后来的纸等等。从需要有较高工艺加工这点来说，可以看出我们祖先的文明发展程度。

其次是书写方法：中国所采用的书写材料对书写方法有特殊要求。例如：有的要用锐器去刻划；有的要用涂料去书写。这同国外其它五个文明发源地来说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字的特点，书写材料的特点和书写方法的特点，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艺术。例如：篆刻和书法等。这是与他们不相同的。

（三）中国关于书籍材料的发明，在世界书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纸张的发明是应当在世界文化史上大书特书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而它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

纸，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在我国创造出来的。这不仅为全世界所公认，而且有实物可佐证。

一九五七年，西安市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这就是人们说的“灞桥纸”。其实，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在新疆罗布泊汉烽隧遗址上，出土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显然，这些都证明了，至迟在公元前二

世纪就产生了纸（经化学分析，“灞桥纸”的主要成份，是大麻和少量的萱麻的纤维制成）。纸的产生，不仅逐渐取代了我国古代书写材料如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之类，而成为人类记载文字最理想的记载物。

其次，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上推到印章和石刻的战国时期。因为，正是印章和石刻方法的长期使用，才给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我们有理由把古代人们采用捶拓方法，获得石刻文字拓片的做法，认为是最原始的，最早的印刷术。公元一千三百年前的隋朝时期，我国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技术——雕版印刷术，即刻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术就是直接把反手字雕在木板上，用刷子把墨刷在凸起的字上，铺上纸，加以捶拓印成书页的一种方法。雕版印刷术虽然比手工抄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制一块版费力很大，功效不高，因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改进印刷的方法就显得完善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远比在欧洲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谷登堡要早四百多年。而且据考证，谷登堡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第三。墨，是随着印刷术，特别是雕版、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由煤制成的墨，可溯源到中国的远古时期，它的质量优良，一向被世界学者所称颂。德国汉学家骆飞说：“中国墨的优良，绝非西方的产品可比，使用了许多世纪，直到如今，仍无它物可以比拟。”中国的墨，在《尚书》中有两则关于墨的记载：《舜典》篇中记：“象以典刑。……五刑有服”。又《伊训》篇上有记：“墨，墨刑也。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则以墨刑加之”。据此，说明古代刑法中，有一种墨刑。

一九三七年，美国人怀疑甲骨文字中有朱砂和墨书写的，认为在奴隶社会时代，中国人不会发明朱墨，而可能是用奴隶的血来书写的。所以《工业及工程化学·分析版》作了颜料的微量分析。证明，甲骨上书写的文字，红色是朱砂，黑色是碳素单质（现代墨的原料）。据此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墨创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

一九七五年，湖北江陵楚故都纪南城内发掘了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在大批随葬器物中，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碎墨。根据出土的竹简木牍得知，此墓是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埋葬的。此墨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墨的实物。

在汉代，墨同纸一样成为诸侯进献朝廷的贡物。同时，在国家举行庆典时，皇帝还常用墨来赐赠大臣或学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墨的历史是由漆而石墨，最后发展到烟墨的。这种先自然后人工的进展，显然是有道理的。宋人赵希鹄说：“上古以竹挺点漆而书。中国有墨石，可磨石以书。至魏晋间，始有墨丸，以漆烟和松煤为之。”元人陶宗仪和清人姜绍书也都说，中国墨的发展过程，是依漆、石墨和烟墨次序进化的。这些道理，从人类认识世界的原则（从低级到高级）说来是正确的，可信的。

第四。笔，中国的毛笔，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一项独特的书写工具。关于笔（通指毛笔）的产生年代，考古学家，根据对河南仰韶和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证所发现的彩陶上面的花纹及符号后，认为：它们都是用毛笔画上去的。（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明》一文）。可见，笔的产生历史可追溯到史前时期。还有的专家

认为：笔的应用是在商、周时代之前，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金文款识，很显然是使用毛笔的结果。商代的甲骨，其卜辞已有用毛笔和墨汁书写而未契刻的（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同时，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表示笔的聿（聿）字（见23页表）很清楚地显示出，是右手握着一管饱满墨汁而笔毛分散的笔。在古代文献中，有蒙恬制笔的说法。在张华的《博物志》上说：“蒙恬造笔。”晋代崔豹说：“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羊毫为被，所苍毫；非兔毫竹管也。”《说文解字》说：“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聿。”有人认为：这几种说法，可能都是由“不律”的读音变化而来；也可能是指以不同的形式或材料制成的同一物质。今天可以见到的最古的毛笔实物，是一九五四年，在长沙古墓中发现的战国笔。（《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十二期）。由此可见，不论是古代文献的记载，或是传说，还是对出土实物的考证，都可以证明，笔的历史源远流长。

书籍的大量生产，流通广远，正是在纸、墨、印刷术和笔的结合使用之后的事。可以认为，离开了纸、墨、印刷术和笔的产生和发展，来设想书籍的广泛流传是不可能的。直到今天，尽管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传播媒介，但都不能，也不可能代替纸和印刷术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和优势。这是被事实证明并将继续受到验证的事实。

中国文字除一般文字通有的意义外，它还有其特殊的形体（现在使用的方块汉字是古代好几种表意文字里唯一能够流传和巩固下来的表意文字），这种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